

中国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演进

谷 显 明

(湖南科技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 关于“乡土”的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自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后至20世纪三十年代为乡土小说发端与拓展期,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小说流派—乡土小说流派;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为乡土小说承继与变调期,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乡土小说在延安讲话的规范下,逐渐走向“农村题材小说”发展道路;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为乡土小说转型与新变期,这一期间的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枷锁,重返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并在新世纪前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回望乡土小说走过的近百年历程,无论是现实的、或者是历史的,是浪漫的、或者是现代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演绎着不同的乡土故事,每一个乡土故事又承载着作家不同的乡土经验,并从中折射出作家对乡土中国近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思考与追问。

[关键词] 现代性; 乡土小说; 发端; 变调; 转型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3-0106-05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千百年来,在传统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村落社会,人们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常年以种地为生。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2],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因此,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也指出,中国“清末城市生活的特征,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与五百年前宋代的情况极为相似”^[3]。可见,中国作为一个农耕历史悠久的国家,传统社会极具乡土性,因此被学者谓之“乡土中国”。但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近代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封闭格局被打破,城市与乡村不再是一体化的存在,整个社会呈现城乡分离的局面。这为文学发现农村、发现农民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广阔视角。因此,关于“乡土”的书写成为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乡村和农民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文学场景和文学形象。纵观百年乡土小说发展历史,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发端、变调和转型等发展阶段,构成了对乡土中国的现代性想像。

一 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拓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用鸦片和枪炮

打开了清帝国大门,中国被迫开启了现代化历史进程。这一时期发生的五四启蒙运动,使得中国大地上掀起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的热潮。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许多生长于乡土、后侨居城市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启示和烛照下,开始把视线更多地聚焦身边的乡土,并以此来想像和思考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问题。其中鲁迅以“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启蒙主义精神,率先开创了现代乡土文学批判性创作主题,用生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描绘出小农经济破产下农民的悲苦命运,在客观冷静的描摹中展开对国民性的批判,传达出对“病中国”底层农民命运的关切。像《故乡》通过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的对比,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对广大农民的禁锢与毒害;《祝福》通过祥林嫂这一悲剧式人物,展现了“三纲五常”封建思想对广大妇女的压迫和奴役;《狂人日记》通过塑造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形象,揭露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吃人状况;《阿Q正传》则通过一贫如洗的农民阿Q的“革命幻想曲”,透露出“死水似的”中国农村泛起些许时代的波澜。对此,著名学者王瑶先生指出:“在小说里,把农民当作主人公来描写,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4]

[收稿日期] 2016-03-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下人进城叙事与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资助(编号:13YBB097);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重点项目“新时期三十年乡土小说研究”资助(编号:15A075)

[作者简介] 谷显明(1976-),男,湖南永州人,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一批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家陆续出现在中国文坛。像许钦文、王鲁彦、沈从文、赛先艾、冯文炳、许杰、彭家煌、潘训、台静农等,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其小说创作展现出长期封建统治下农村落后、破败和萧条的社会现实,构成一幅幅20世纪初宗法制农村社会悲惨的生活图景。如潘训的《乡心》、王任叔的《疲惫者》、赛先艾的《到家的晚上》、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展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下衰败凄凉破产的乡村景象,喊出了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无数“悲惨的弱者的呼号”;赛先艾的《水葬》、许杰的《残雾》、彭家煌的《怂恿》、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揭示了封建宗法制野蛮残酷的乡村陋习,展示出封建中国农村令人震惊的落后;许钦文的《疯妇》、台静农的《烛焰》、许杰的《赌徒吉顺》,则叙述了封建文化戕害下的农村妇女悲惨命运。潘漠华的《乡心》、彭家煌的《怂恿》、许杰的《惨雾》、徐玉诺的《祖父的故事》等作品,以冷隽的笔调书写出宗族纠葛、兵匪争战、地租剥夺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示出下层劳动者顽强的求生意志及其被扭曲的生命形态。这些作品取材于各自的家乡生活,热切地关注着社会人生,用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近代中国乡镇村民的生命图景,揭露了封建势力对中国农民的摧残,其间点缀的剽悍民风中包含着的冷酷、野蛮的传统习俗,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奇异的风土人情。这些作家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拓宽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涵,推动了外来文学和本土地方色彩的结合,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繁荣作好了准备。

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们,在题材选择上不再孤立地描写某一个体或某种生活现象,而是更加注重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去剖析农村问题。如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蒋牧良的《赈米》、丁玲的《水》、荒煤的《秋》、夏征农的《禾场上》等作品,反映了“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等社会问题,以沉重的笔触叙写出乡民们土地无收的惨状,揭示出农民贫困、农村破产的社会根源。蒋牧良的《赈米》与《旱》、荒煤的《灾难的人群》、丁玲的《水》等作品,以沉重的调子叙写出30年代自然灾害导致农民土地歉收的惨状。叶紫的《火》、王统照的《山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等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大革命失败前后农村土地革命的清醒和对沦陷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相对于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而言,这些

作品在剖析纷杂的历史事态、激越的时代风云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现状,包含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悲壮的民族情绪,从而实现了从淡淡的哀愁到犀利的批判的转移和超越,形成以左翼作家为主体的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在意识形态话语的笼罩中,他们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及‘异域情调’的风景画、风俗画的多种艺术方法的描写,既是对早期‘乡土写实派’的历史回应,又开创了新的乡土小说范式,为20世纪40年代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和发展路径的启示。”^[5]

二 乡土小说的承继与变调

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经由不同类型的作家,得到了差异性巨大却也不妨视为互相映照的表达。这一期间,国统区的乡土小说作家承继国民性批判的传统,描绘农村遭遇的现实苦难,对落后停滞的封建伦理道德和愚昧的国民性进行了更加深邃而犀利的批判。像艾芜的《回乡》、王西彦的《古屋》、沙汀的《兽道》等作品,表现了乡村民间的苦难和野蛮的封建习俗,深刻地批判了古老乡村伦理道德和封建思想;艾芜的《石青嫂子》、《山野》、《故乡》等作品,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沙汀的《淘金记》、《还乡记》、《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作品,对四川充满血污的乡村现状进行了客观描写,同时揭露讽刺了国民党政治上的极端腐败;碧野的《肥沃的土地》、艾芜的《丰饶的原野》、路翎的《燃烧的荒地》等作品,从民众身上发掘“原始的生命强力”,写出了蕴含于农民体内的原始粗犷的强大力量。这些作品延续着茅盾等人的社会剖析派小说风格,同时,由于“对暴露和讽刺了解上的肤浅,限制了这一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文学思潮开始走向衰落”^[6]。

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切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从此颠覆了以往一切旧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原则。在解放区意识形态话语下,乡村社会特征及革命战争的背景促进了“革命乡土小说”的兴盛。像赵树理、周立波、丁玲等一批作家改变创作方法上的小资“矫情”,将目光聚焦在解放区大规模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展了解放区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其中赵树理就是解放区创作农村题材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

家。在《讲话》发表的前后几年,赵树理经常深入解放区农村,与农民群众朝夕相处,把创作目光聚焦中国农村和农民,用农民自身视角审视和观照农民的生活形态,创作出为农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他的早期作品《小二黑结婚》,堪称农村题材小说的典范之作。在这部小说中,赵树理突破20年代乡土小说感伤忧郁的书写风格而展现出解放区农村清新活泼的喜剧气象,同时从民族性格和文化层面昭示出中国农民的历史沉疴。在《小二黑结婚》引起强烈反响之后,赵树理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小说对农民翻身解放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写出了解放初期复杂的农村政治生态。此后,赵树理又推出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堪称中国农村大变革的历史画卷。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不仅促进了解放区通俗化乡土小说的蓬勃发展,也对解放后的乡土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赵树理的影响下,以山西作家马烽、西戎等人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其乡土小说创作进一步向旧形式的通俗小说转变。其中《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就是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传奇性特点,用旧章回体形式书写的农村题材小说代表。

同时,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乡土作家,在“赵树理方向”的指引下,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荷花淀》等长篇小说。其中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这两部长篇巨著全景式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书写出土地改革运动给农村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乡土小说形式、语言凸显的大众化、通俗化,均显然受赵树理小说的影响,并且这一传统一直延伸到建国后乃至70年代末的乡土小说创作。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作品,“与19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对苦难乡村的阴暗展示,与以沈从文为首的对田园乡村的咏叹,无论是题材的选取与处理,还是叙述者的文化身份,都存在着差别。”^{[7]163}这一期间,“风俗画、风情画和风景画作为乡土小说必备的艺术要素,也逐渐从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退场,乡土小说也随之蜕变为农村题材小说”,尤其是文革期间浩然等人的乡土小说创作,彻底沦为了“政治的传声筒”^{[7]216}。可以说,从20世纪4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后期,乡土小说在《讲话》的规范下,逐渐演变成“农村题材小说”,形成了这一期间乡土文学创作的变调。

三 乡土小说的转型与新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文艺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80年代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枷锁,重返20年代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得到承接与重建,“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再次回到乡土小说的本体之中。这一期间,暴露“伤痕”,深入“反思”,渴望“改革”成为乡土小说的创作主潮。作为早春时代信息的“乡土伤痕小说”,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古华的《芙蓉镇》、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作品,突破了现实题材的禁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文革”极左政治下的乡土现实及农民生活,表达了整个民族在拨乱反正中痛定思痛的感伤情绪。尤其是古华在长篇小说《芙蓉镇》中采用“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绎乡镇生活变迁”的叙事方式,唱出了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展现了一幅悲凉的人生画卷。这些作品对“乡土风光及民风民情的诗意描绘因其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至今仍然是脍炙人口”^[8]。此后,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进而促进了反思文学的应运而生。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是其中的代表作。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注重关注和思考改革发展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在这期间,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燕赵悲歌》、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等,成为农村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其中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中,承继“鲁迅风”写出了在跨入新时期门槛时农民的精神状态,揭示了“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重塑民族性格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在改革中发生变异的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层面。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也随之进入国内,尤其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1985年,韩少功在《作家》杂志第6期发表了《文学的根》一文,开始了“寻根小说”的理论探寻。此后,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

的《文化制约着人类》等文章,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的根脉,努力开创具有真正自己民族风格的文学。在“寻根思潮”前后,一些作家以现代意识反映传统文化,致力于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涌现出一批“寻根小说”作品。如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郑义的《远村》、《老井》,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等,这些作品彻底摆脱了对生活历史进行单纯政治层面的剖析,而把探寻的笔触伸进了民族历史文化心理,从政治批判层面转移到历史文化反思层面。同时,作家们注重“异域情调”和“地方色彩”的发掘,作品中浸染着富有地方特色的风俗画描写。比如阿城的《棋王》通过王一生在“文革”时期的人生经历,表达了自己对庄禅哲学的认识态度和对传统文化地位价值的思考;韩少功《爸爸爸》对传统文化长久积淀下来的负面因素进行了审视和批判;王安忆的《小鲍庄》则表达出对以仁义为内核的传统文化虚构性的批判,以及对传统儒家文化压抑人性的揭露。莫言的《红高粱》展示了高密东北乡的地域文化风貌,表达了对原始强悍生命力的肯定与赞美。此后,一批作家延续寻根文学的精神内核,把目光向“下”看、向“后”看,热衷于对生存本真状态的关注,同时摒弃了寻根文学的浪漫化期待,更加关注底层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出现了一批“新写实乡土小说”。在对乡村苦难的书写中,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随着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日益逼近,中国稳态的农业结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开始面临解体,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幻化出的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严重对立与猛烈冲撞的社会景观和人文景观呈现在人们面前。”^{[7]436}一大批乡土作家面对多元化的语境,在直面现实、文化批判、历史反思和家园守望四个想象域进行了大胆地开掘和探寻,乡土小说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像何申的《年前年后》、刘醒龙《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谭文峰的《走过乡村》等“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还有张继的“村长系列”、“乡长系列”,承继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手法,把目光和笔触直接切入了基层农村,表现了改革背景下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生存状态。尤凤伟的《泥鳅》、荆永鸣的《北京候鸟》、鬼子的《被雨淋湿的

河》、陈应松的《太平狗》、孙慧芬的《民工》、贾平凹的《高兴》等,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展现出数亿计乡下农民背井离乡进城谋生的生存境遇;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阎连科的《受活》、关仁山的《天高地厚》、毕飞宇的《玉米》、葛水平的《凉哇哇的雪》、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等小说,对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政治、伦理等进行了揭露,呈现权力挤压下人性泯灭的乡村现实图景。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下城市化浪潮冲击下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脉动,书写出乡土田园牧歌情调走向消逝的社会现实,凸显城市化语境下乡土小说的某种转型与新变。另外,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贾平凹的《土门》、《秦腔》等小说,则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反思,书写出乡土精神家园的终结。陈忠实的《白鹿原》、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莫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刘玉堂的《乡村温柔》等小说,以史诗、寓言、传奇、喜剧等形式,在历史中展示人的命运,以人的命运阐释历史的意义。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张炜的《刺猬歌》、阿来的《空山》、赵本夫的《无土时代》、贾平凹的《怀念狼》、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等小说,对乡村生态危机现状进行了揭示,批判了现代文化的人类中心主义观,表达了一种对现代性的抵抗与反思的话语。

综上所述,伴随着百年乡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乡土小说”大致经历了三次跳跃式发展,即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到40年代至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再到新时期以来的新乡土小说,这三个阶段的演进过程一脉相承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同时,乡土小说在不同阶段的演进过程中,虽然在形式上存在某种差异或者较大分歧,但在内容上都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农村社会状况和农民生活现实。站在新世纪之初的时代门槛上,回望乡土小说走过的近百年历程,无论是现实的或者是历史的,是浪漫的或者是现代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演绎着不同的乡土故事,每一个乡土故事又承载着作家不同的乡土经验,并从中折射出作家对乡土中国近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思考与追问、记忆与想像。当前,随着乡村城镇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孟德拉斯所言的“农民的终结”,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种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现实。面对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中的乡土中国,乡土作家们一方面将书写视角延伸到乡土之外的城市空间或者荒野边地,另一方面在乡土中国“去乡村化”旅途中执意为即将逝去的农耕文明奏唱一曲无尽的

挽歌。对此,有学者便发出乡土文学可能将走向消亡的疑问与担忧。但在笔者看来,在乡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终结”并不代表“农业的终结”,或者说“农村生活的终结”,因此,在这个充满文化矛盾和心灵裂变的历史过程中,未来中国乡土文学非但不会走向消亡,而且必将产生出更多更好更伟大的乡土文学力作,也必将呈现出更加复杂更加多元更加绚丽多彩的乡土中国图景。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
- [2]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3.
- [3] [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7.
- [4]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99-100.
- [5] 丁帆.论“社会剖析派”的乡土小说[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78-83.
- [6] 刘增杰.文学的潮汐[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1-16.
- [7]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8] 丁帆,等.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ocal Novel

GU Xian-m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99, China)

Abstract: The writing about Local has always been a basic motif in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local novel has roughly undergone three stages since 1920s. The 1st stage starts from May 4th Movement to 1930s. In this period with the elicitation of Lu Xun's thought of Remolding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China's first school of novel--the Local Novel School emerged. The 2nd stage starting from 1940s to the mid-late 1970s was the modulation phase of local novel. During this phase, owing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Yan'an Speech, the local novel in liberated area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gradually followed the road of Countryside Theme Novel. The 3rd stage starting from the late 1970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was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local novel. Local novel in this phase extricated the political chains on literature, returned to the aesthetic aims of local literature and demonstrated a trend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century.

Key words: modernity; local novel; initiation; modulation; transformation